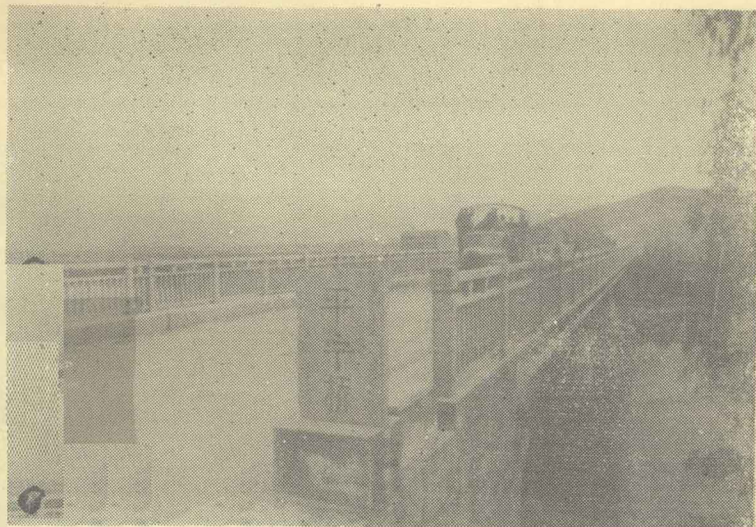


施秉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施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施秉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施秉县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高中元

责任编辑：刘世荣、高中元

校 对：李心仪 潘文权 罗鸿翔
 高光前 焦 泉 高中元

目 录

1. 朱伯屏领导的农民暴动……………高中元 (1)
2. 我所知道的朱伯屏……………杨天炳 (32)
3. 黔东事变翁哨起事中的贺瑞成……………成文魁 (39)
4. 苗族将军龙正才……………雷震、龙家华 (48)
5. 忆解放前施秉中学……………吴继忠 (54)
6. 施秉发展三青团组织概况……………吴继忠 (56)
7. 施秉烤烟生产发展简史……………杨开中 (59)
8. 回顾解放初期施秉粮库工作……………何 霖 (63)
9. 解放初期抢修施秉大桥情况……………鲁 急 (65)
10. 忆在镇远专区革命干校学习
 的日日夜夜……………杨祖芳 (70)
11. 国民党施秉县长董公石“应变计划”
 的破灭……………黄克雷 (78)
12. 匪首杨再植落网记……………姚茂新、黄克雷 (84)
13. 施秉气象站发展简况……………磨映先 (88)
14. 施秉气候之最……………磨映先 (95)
15. 施秉农业天气谚语……………磨映先 (101)
16. 五十年代施秉供销工作概况……………李克栋 (111)
17. 施秉县大事记 (1912—1985) ……任祥润 (121)
18. 施秉县历年人口统计资料
 (1911—1985) ……任祥润 (144)

朱伯屏领导的农民暴动

高 中 元

- | | |
|---------|---------|
| 一、赴马鬃岭 | 二、官逼民反 |
| 三、组织队伍 | 四、初战失利 |
| 五、严峻考验 | 六、撤离翁哨 |
| 七、转战八县 | 八、全家被捕 |
| 九、仲屏招安 | 十、再举失败 |
| 十一、伯屏自缢 | 十二、撰后的话 |

附 后:

- | | |
|-----------|-------|
| 1.朱伯屏布告二张 | 杨英兰口述 |
| 2.吴宗尧布告一张 | 肖耀志口述 |
| 3.陶杰报告一份 | 高志清口述 |
| 4.朱仲屏报告一份 | |
| 5.调查材料三份 | |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正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相持阶段。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而国民党政府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贪官污吏,“无耻员胥,公门败类,假借官威,凌侮百姓,侵吞敲诈,剥民自肥,致令含冤莫诉,积愤难平,因而怒毒官衙反对政府者,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黔东各族人民，揭竿而起，高举义旗，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贪官污吏的群众性暴动，当时统称之为“黔东事变”。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性“事变”中，一支活动范围较宽（多达八县境内），延续时间较长（先后半年之久），国民党政府最恨（“照得朱逆伯屏，黔东第一罪人”）的起义军，这就是朱伯屏领导的农民暴动队伍。

朱文藩，号伯屏，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施秉县上翁哨大干田人。其父显亲，号平阶，早年曾任

秉县北区区长，晚年为施秉同善社社长，从事经营农业，兼作工商和行医，以至家道日富，当时有田地约五百余挑（合一百市亩左右），佃给吴正德、潘裕民等十来户农民耕种。另外开设有榨油、碾米、糖食、米粉加工作坊和一个金果（即经营糖果、油、盐等）铺，是凤仪乡及其周围较为富裕之户。平阶有四子：长子文藩，号伯屏。次子文藻，号仲屏，毕业于周西城办的讲武堂，在军界任职多年，参与伯屏领导农民暴动，中途招安，一九五〇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三子文辉，号叔屏，少有文化，自耕田地，兼作工商。四子文伟，号季屏，长期从事军界任职，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后勤主任，一九四五年在南京被日军暗害。

朱文藩，少时就读于施秉初、高两级小学，贵阳旧制中学和袁祖铭办的陆军小学（讲武堂），曾在军界、政界任职多年。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在王天培部第十军当副官，随军北伐，十军解体回施，经友人推荐，任镇远厘金局长（似现在税务局长）。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镇远成立黔东行营，经黄烈侯（朱旧友、行营主任）推荐，

任黔东行营少校副官长。民国二十三年，桂军廖磊部入黔，黔东行营撤销，在桂军军部任少校副官长。民国二十四年桂军调回广西，朱伯屏回归乡里，见地方上匪盗横行，人民不得安宁，于是在地方上组织民团办团练，北区境内肃然，出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遂将翁哨场改名安定场。他生性刚强，见义勇为，好为民打抱不平，国民党政府及其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疾恨如仇。他仗义疏财，接交甚广，特别是对广大劳苦人民，从不仗势欺压，总是平等待人，并在物资上经常接济他们，成为许多农民的好朋友。因此他号召农民起义，都愿意跟着他走，不少人在战斗中与之结成生死之交。

朱伯屏组织领导农民起义，象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一样，有迷信思想的影响，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神论者。也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他只打贪官，不扰民众。而更主要的则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无端盘剥，官逼民反。他利用了为其长子结婚的机会，组织队伍，择日起义，瞒过了官府。开始暴动失利，巧妙周旋，大军压境时，适时地撤出翁哨据点，避免了硬拼造成的不必要的伤亡。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兵力尾追堵击，步步进逼，全家亲人深陷监牢，弟仲屏带队招安，都没有使他动摇过。眼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解散了仅有的队伍，独居洞穴，宁死也不投降，自缢而终。

朱伯屏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取得胜利。纵观历史，注定了他必然失败。然而他顺应了历史潮流，代表了时代前进的力量，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他的作为，表现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高尚品德和可贵的抗暴斗争精神。

赴 马 鬃 岭

据定国军第五路总指挥吴宗尧（曾任王天培部新兵团长，玉、岑、青、惠四县联防指挥、同善社“天恩”），朱平阶（伯屏父、同善社社长）交待的材料，朱伯屏与当时在翁哨办道的石宝山（松桃人，同善社“证恩”，人称“石善”），在起事之前，受吴宗尧、杨世弼（同善社“引恩”）联名之邀，曾前往湖南晃县登丰乡马鬃岭与吴、杨面会。据吴宗尧自白书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三月初，

大先生焕章、荣大先生吉士到洪江召集各处恩职会坐，到者约四五十人。在前只演说修身养性之学，至一星期忽然发表云，尔等谨守秘密，次我等前来非仅会坐，另有特种重大任务向各位发表，今乃龙华山会收圆之期，有真命人主下降治世，效封神故事，天命委之名山洞府，剑仙侠客及同善社等诸人物辅助办理，列台恩众既入道场，自应遵命奉行，须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候机听命，填勿泄漏，免受黑煞神之谴责。今带有青布旗帜数百首，长六宽五，经高人敕过法力无边，随带身旁，能避枪炮，发与尔等，有出力效命者，可转发护身。总之谨守慎密为要，此系初发表之情形也。又四月二十间，荣吉士二次到洪江，……荣向尧云，约尔之来，因前三月内所谈之事，现在大概时机不远，有组织计划一切向尔详告，俾尔明瞭此次计划，对于特种工作另有政治人员负责，军事组织将来编制以帅军路师营旅队哨为标准，现湖南为第二军，军之下又分为五路，第一路乃长沙附近各县；第二路常德、桃源一带；第三路会靖、绥通；第四路凤凰、麻阳接松铜等县；第五路湘黔边境芷黔晃及青玉岑

等县，统名之为定国军。虽则分派已定，但各县暂时只可将大队、中队、分队名义委出。其它名义不可妄委矣，候改编以免纹乱。第五路责成杨世弼、杨福田、秦宗炳与宗尧等负责待命，尔等工作务宜联络地方民众，利用地方武力各镇一方，保天拯民，定国军到时出而欢迎，不可抵抗。至于经济，各路早经筹备，第五路经济杨世弼负责支配。此乃辰谿会荣之经过也。至五月二十间，杨世弼、杨福田到尧家，世弼并函知石宝山偕朱伯屏同来，世弼将一切密情向石朱告之，并各领去旗子数首，……”。朱平阶的自白书亦云：“去年（指一九四二年）阴历六月底，民长儿伯屏，经湖南晃县马鬃岭吴宗尧约去云，有善社上层先生在彼前往商讨善社事务，伯屏转家，言及吴宗尧称云，组织有定国军，名目若干军，未详军以下分路师团旅营哨队。湖南湘西与黔东为第二军第五路，以下为八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名目，伯屏为义字营统领，吴宗尧为五路司令……”。

朱伯屏去湖南马鬃岭之行，实乃密商并接受起义任务。回施之后，即号召民众组织暴动，乃源如此。然而考察其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这不过仅仅是一个引子罢了。

官 逼 民 反

刘时范在《朱伯屏施秉暴动始末》一文中，言及“朱询吴宗尧‘谁是真命天子’，吴谓此尚不得其详，在辰谿时，彼亦问及李焕章，李以‘若问天子名和姓，八牛治世掌乾坤’两语相告，并囑切守秘密，以意度之，当系朱府大明之后云云。伯屏闻而甚快，归以语其父，请神降乩，虔求指示，乩笔有‘三三五五是良辰，朱家天子杨家将’之

语。伯屏暗自忖量，隐然以天子自况，其父亦默然以翁哨风水自慰。迨石宝山由翁哨返松桃后，朱伯屏父子互究‘三三五五’及‘杨家将’之义，平阶恍然大悟，语伯屏曰：‘三三’九月也，‘五五’二十五日也，九月二十五日起事，良辰也。‘杨家将’之意，是明示须多罗致杨姓将校以为汝助也。伯屏聆父训，暗定九月二十五日（阳历十一月三日）举义，一面觅杨姓之有力分子，纵横联系，九月中旬为其子恩福结婚，乘机大开筵宴，会集党羽”。从这段文字上看，朱伯屏领导的农民起义，然以至整个“黔东事变”，是否都是天命神灵的驱使，这无疑地歪曲了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纵观过去，在我国农民运动史上，早在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他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争取了广大的起义民众。在十九世纪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也是以他创立的“拜上帝会”来号召民众，集合队伍的。朱伯屏虽然受过新时代教育，但他信奉天命神灵，不可能摆脱旧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神论者，这是其一。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施秉的广大地区，曾经是红军路过或转战过的地方，红军的革命宣传，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及打官府和打富济贫的革命行动，在施秉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朱伯屏亦其然。他仿效红军的作法，在起义时，把自己的家财分给了贫苦的农民，起义以后，规定了起义队伍严密的组织纪律，专打腐败的政府和贪官污吏，劫富济贫，保护穷苦百姓，这些行动都是以红军为榜样的，这是其二。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而地方政府及其贪官污吏，假借抗日之名，对人民实行繁杂的压榨与盘剥，横征暴敛，民不

聊生，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如一堆干柴，着火便成为燎原之势，这是其三。由于上述原因，朱伯屏自马鬃岭回施秉之后，在“候机待命、慎勿泄漏”的情况下，除了秘密筹划，暗中个别串联外，不可能也不允许他公开地广泛地宣传和组织民众，正是他上奉天命，下顺民心，举旗号召，四方响应。因此，一经他高举义旗，号召民众起来抗暴斗争，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有限的地域里，集合起千人左右的农民队伍，这才是最本质的原因。刘时范在《黔东事变纪要》中不得不供认：“黔东事变”“然竟千里从风，群马骚动者，一由于民智较低，不能识是非之辩，严邪正之别，一由于公务人员过于重视权威，而勿于勤施教化，遂一般民众，只觉兵粮不诛求，而不知御侮之需要，只觉禁烟之束缚，而不察鸦片之毒害，若夫无耻员胥，公门败类，假借官威，凌侮百姓，侵吞敲诈，剥民自肥，至令含冤莫诉，积愤难平，因而怨毒官衙反对政府者，则又助因中之重要者矣”。施秉县长许中杰写的《黔东事变报告书》中也不得不供认：“一、战时政治对民众要过繁重及基层吏治人员之掣肘。平时推行地方自治工作，政令简单，加之过去地方官吏松懈，民众未感受刺戟，迨战时征兵征工赋粮及其他临时法令，较昔繁复，地方官执行行政令，已较昔严格，对民众要求繁重，因负担大而深感刺戟，复以基层吏治人员之踰法掣肘，致令民众对政府官吏深怀不满。二、奸伪乘隙活动。民众因知识过低，不能体谅政府战时政令之实施，而萌反对之念，落伍军人及失意政客网识大体，阴出捣乱之谋，奸伪即利用弱点，造隙活动，宣倡不当兵少纳粮种鸦片烟等口号以号召民众”。归根到底，还是腐败的政府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官逼民反，不得

不反”。

组 织 队 伍

朱伯屏自马鬃岭回施秉之后，就着手策划暴动事宜，决定在民国三十八年古历八月二十八日（公元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乘为其长子恩福结婚之机，大请四方宾客，大摆喜庆酒宴，以便集合人马，组织暴动队伍的骨干力量，为举行起义进一步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酒宴之中，秘密联系的骨干是心中有数，而周围的广大亲朋及其民众，则纯属是为了吃酒庆贺。举行婚礼这几天，朱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溢，客人往来，络绎不绝，真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在客人中，除了有镇远的杨玉和（镇远起义的领导人），徐湘安（朱伯屏队伍的第三路指挥），台江的陈信哉（台江起义的领导人），湖南晃县的吴宗尧（定国军第五路总指挥，即“黔东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外，都是施秉县人士。有他家的亲戚朋友，有县和区、乡政府的官员，更多的则是本地周围的保甲人员、壮丁和乡村父老。估计有千人之众，摆席一百余桌，先后筵宴五六天时间。这个时候，石宝山领导的松桃农民起义，罗殿卿领导的玉屏农民起义，已在古历八月二十日先后举行暴动。进行这种习俗的热闹场面，目的在于掩盖国民党政府耳目，以免引起他们的警觉和怀疑，好进行自己的准备工作。乘着外地的起义领导人在场，拟定攻城计划，以便在行动上互相配合。《黔东事变纪要》云：“朱伯屏既蓄翼谋邀杨（指杨玉和）为助，杨漫应之，朱子恩福结婚，杨前往道贺”。又云“两杨（指杨玉和、杨树勋）攻穗劫狱计划，皆朱伯屏主之，黄仲达成之也”。可见他们并不是各自

孤立的。攻打施秉县城的计划，确定以清明乡乡长贺瑞成（“贺颇有实力”，又与县长许中杰结拜金兰）带领清明乡壮丁以保护县城为内应，实行内外夹攻的破城战术。同时暗地组织队伍，确定各级指挥人员，再由他们各自分头组织召集。据有关资料记载，“初步号召得五百三十九人”。设立总指挥部，朱伯屏为总指挥，下设侍卫队，参谋处和三路指挥。以潘裕民为侍卫队长，杨其相、雷昌林、陈子华、夏伦常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队队长。其弟朱仲屏为参谋长，辖四队：第一队长李云章；第二队长杨开林；第三队长曾光明；第四队长李云书。以龚以成为第一路指挥，辖四队：第一队长许帮初；第二队长何乾芳；第三队长刘辅金；第四队长陈兴国。以肖云清为第二路指挥，辖三队：第一队长钱显位；第二队长陈少奎；第三队长陈治益。以徐湘安为第三路指挥，辖四队：第一队长李云吉；第二队长李显臣；第三队长杨光斗；第四队长蒋少清。各队人数多少不一，少则十几人，多则三十人不等。一支完全由农民集合起来的暴动队伍，在酒宴中初步组织起来了。

初 战 失 利

朱伯屏在办地方团练时，直接掌握的武器，计有各类长短枪八十支，砍廉刀（即有二市尺长刀锋的一种大刀，亦称砍牛刀）八十把，加上起义者自带的部份土枪（即火药枪），武器仍然很缺乏，有近半数的人无刀枪。于是临时决定在起义（即攻打施秉县城）的头一天即古历九月二十四日晚上，攻打文德关弹药库，窃取枪支弹药，以便装备队伍。这天晚上，只通知上翁哨周围几个寨上的人，大约二百人左右，由朱伯屏亲

自带领前往，途经清明乡时，沿途又增加肖云清的部份人员，总计不过三百人。由于正是月黑头上，伸手不见五指，怕队伍走乱，朱伯屏的迷信思想又严重，企图借助神灵保佑取胜。队伍摸索到接近弹药库时，不仅不注意隐避自己，反而在每个人的头上，插上一柱点燃的香前进。由于松桃、玉屏、镇远等处的农民暴动已经打响，国民党镇远专员公署已引起警觉，加强了文德关弹药库的戒备。因此朱伯屏的队伍接近目标时，早被守库部队发觉，首先向起义队伍发起猛烈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尤如雷电轰鸣。这一先发制人的措施，对于没有实战经验的朱伯屏及其所率的农民队伍，一时乱了阵脚，指挥也失了灵。有的向前冲，有的胡乱放枪，有的往后跑，人员遍坡皆是。既然对方已有准备，又居高临下，难于攻破，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迅速收兵而回，行至甘溪的猫耳洞，碰上肖永亨带去挑枪枝弹药的八十余人，天亮之前一起回翁哨。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即公元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是朱伯屏率领农民起义的日子。起义农民带着枪刀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汇集于翁哨。这天上午八时许，县长许中杰接到镇远专员公署“据报该县朱伯屏参与此次匪伪委主力伪第六路指挥仰拘扑为要”的密电，“是日午后派国民兵团副团长罗天伦、督练员刘燧……翁哨侦察，藉检阅壮丁为掩饰，暗嘱必要时得掌握一部份精干壮丁带城整训；伊等去后及晚未归，疑虑其必有变，继使探之，知确被朱逆扣留矣”。朱伯屏扣留了罗天伦、刘燧之后，便到翁哨小学门口的坝子上，举行出征前的誓师大会，朱伯屏发表了长篇讲话，其大意是：国民党政府，借抗日战争之名，既抓兵，又派款，凌辱

百姓，发国难之财，大家生活不下去了，这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打倒贪官，免兵免款。他为了表示与政府一刀两断，率领民众与政府对抗到底的决心，誓与弟兄们同甘苦，共患难，当即宣布将他家的全部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所有田地分别给附近各寨上的农民耕种，家中盐巴、布匹等财物，可以谁缺谁拿，缺多拿多，缺少拿少，并说：我朱伯屏不是缺吃少穿，也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带领你们大家打贪官，是为了我们凤仪，为了我们施秉，为了让大家都过好日子，只要天下太平了，我就到云台山去当和尚。由于朱伯屏经常接济贫苦，待人平等、和气，主事公道，言行一致，在地方上素有声望，群众信得过，都愿意跟着他打贪官，除暴安民。并随及宣布这支农民暴动队伍为“中华定国军”，他是总指挥，以及组建编队的情况。又宣读了“中华定国军总指挥部布告”（布告附后一）。会上，朱伯屏号召部队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无礼乱来，只打贪官污吏，不得扰乱民众，同时规定了八个不准，其大意是：不准退却逃跑；不准抢劫民财；不准估买估卖；不准持势逞强；不准奸淫妇女；不准与敌勾结；不准贪污行贿；不准杀人放火。违者斩头治罪。后来有的将这八个不准，称作“八斩”。这“八不准”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与吴宗尧的布告（布告附后二）所规定的“十个不准”基本相吻合。随后烧香祭旗，鸣炮出征。公开举起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大旗。

天将黑尽，由朱仲屏带领起队伍直奔县城北面的石排坡、大头坡两坐山坡上，居高临下控制着施秉城。随后朱伯屏赶到，按照事先与清明乡乡长贺瑞成密商的内外夹攻计划的联络信号，在山坡上烧起三堆大火，等待贺瑞成在城内鸣

两枪后随即攻城。然而黔东各地的先后暴动和镇远专员公署的秘电，以及罗天伦、刘烽被扣押的情况，已引起许中杰的疑虑，加强了城防戒备。这天晚上，贺瑞成带领清明乡壮丁从大桥下游的两江口涉水过河，直插县城东门，（当时县政府紧靠东门），守城卫兵发觉查问，一壮丁答是清明乡的，要进城，传到许中杰那里，许立即传令五门，天亮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城。贺知城中已有戒备，只好退至东门外的杨家街暂住，待机而行。而朱伯屏的队伍，未见到城内贺瑞成鸣枪信号，不知究绪，也不敢冒然行动。待至天快亮时，攻城已不可能，朱伯屏、贺瑞成只好率领各自的队伍转回翁哨、清明。许中杰写的“黔东事变报告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探使回报罗、刘被扣，时已夜十二时，乃将保警队及城区壮丁，配置防备，严密部署，一面将经过电报专署，电甫毕，环城四山，火光大作，呐喊厮杀，前来攻城”。

攻打文德关弹药库和攻打施秉县城的两次出征，都因各种原因而失利了。然而起义的旗帜并没有倒下，除暴安民，打富济贫的行动，却进一步唤醒了民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贫苦人民的拥护，这就是从初步号召的五百余人发展到后来千人之左右的一个重要因素。也震动了国民党各级政府，打破了他们任意凌辱百姓的甜梦，他们为扑灭这场熊熊燃烧的烈火，施展了他们一切能够施展的手段。斗争也进入了更为复杂和激烈的阶段。

严 竣 考 验

朱伯屏领导农民举旗暴动，攻城未遂，国民党施秉县政府受了一场震惊。然暴动之影响，贫民百姓之所向，将成为

星火燎原，这使他们更为可怕。县长许中杰的“报告书”有云“朱逆被反攻溃退后，不患匪之不攻，惟恐各乡壮丁之不能掌握，因乃召集新桥、清明、紫荆、双井各乡镇长个别谈话，藉以坚定其信心，于本月（十一月）五日将随即召约各该乡壮丁调集城中，共约五百余人，混合编整，集中指挥，使不得有所活动，并召集政治训话，维系其向心群力”。他们唯恐星火燎原，采取了“以抚为剿策略”。一方面，加强了政治攻势，派本县绅士和朱伯屏在外县的旧友前往翁哨，企图“动以情感，晓以大义，坚劝解朱逆裹胁壮丁转图锄奸，以策善后”，从政治上予以瓦解。另一方面，从军事上加强防剿攻势，要求上方派遣军队，调集本县壮丁，并与外县实行联防，试图一举而歼灭之。在刚刚组织起来，而又两次出征失利的朱伯屏及其暴动队伍，在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攻势面前，是一场意志、信念与决策的严峻考验。从许中杰的报告中可以大致看出政治、军事攻势的情形。十一月六日，派本县正绅周武君、张伟臣（均前清秀才），持县长许中杰、黄平绅耆吴少锋、王建卿信件前往翁哨做说服工作。十一月七日，派请黄平王、吴两绅前往翁哨。十一月八日，又复派吴少锋、王建卿往翁哨，经过多次舌战交锋，朱伯屏始终坚持己见，意志如钢，毫不动摇。但由于各种原因，又不得不采取敷衍、应付态度和灵活的对策。从许中杰报告书和朱伯屏写给许中杰、吴少锋、王建卿的信是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朱逆伯屏，似有悔悟，当将国民兵团副团长罗天伦（被扣督练员刘燧已先脱险）放回，其弟仲屏尤深为感动。当会吴、王两绅启行赴城请罪，至山下里许，诂朱逆伯屏为其父喉使，逼仲屏返，事成僵局，吴、王两先生亦即返